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

若干问题讨论举要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 若干问题讨论举要

苏双碧 主编

齐 鲁 书 社

一九八五年·济南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
若干问题讨论举要**

苏双碧 主编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 14印张 2插页 313千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600

书号 11206·123 定价 2.80元

序 言

中国近代史是指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其间又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为界标，前者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后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本书汇集的仅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历史阶段和历史事件中有争论的主要论点。

三十多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近代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各种观点竞相争鸣。在中国历史学的研究领域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队伍最大，对某些历史事件的研究也比较深入。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近代中国的矛盾又是错综复杂的。一八四〇年以前，中国国内各民族之间也有过矛盾和战争，但多是兄弟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战争；一八四〇年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此，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从阶级矛盾逐步被民族矛盾所取代。毛泽东同志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指出：当时“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又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

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史。”社会性质规定了社会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对象。中国人民要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就必须实行民主革命，把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封建主义的压迫作为主要任务。在近代中国，任何一次进步的运动，都必然要和上述两项任务联系起来，否则就称不上是真正的革命运动。

由于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目的是掠夺中国的财产，变中国为殖民地，不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因此，中国人民在争取政治独立的同时，还要争取经济的独立。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输入，先进的中国人在鸦片和大炮的侵略声中，看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有所“师效”的一面。这样，在近代中国便构成了一幅十分复杂的图案，历史的发展趋向并不是单一的，革命的动力，进步力量的标志都不能以简单的阶级属性来划分。几种力量，几个不同阶级都可能同时涌现出进步的力量或先进的思想家。而这些先进人物其所跨越的历史步伐又往往不是一致的。角度和出发点也往往不是一样的。如主张“师夷长技”的魏源、林则徐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主张镇压农民革命；而《资政新篇》的作者洪仁玕，提出发展资本主义计划，但他是主张推翻清王朝的。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想发展资本主义，却希望保住皇帝。这些进步人士，政治主张不同，但都希望中国富强起来。然而，他们之间又是互有矛盾的。因此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总的趋向，是几个互相关联的任务朝着各自的发展方向在前进着：其一是中国人民争取政治上的独立和民族独立，亦即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没有政治上的独立，就谈不上有经济上的独立。因此，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始终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要

内容。其二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这个阶级出现之后，在争取经济上的独立和政治上的独立方面，作出很大的努力。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这一斗争代表着时代的进步潮流和历史的总趋向。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掣肘，从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出现到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始终是很薄弱的，它没有能力引导中国人民去争取民族独立并最后取得胜利。其三，是向西方寻求真理，先进中国人的努力，贯穿着整个近代中国的始终，在鸦片战争时期，魏源、林则徐就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要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只有首先学习外国人的“长技”。以后，洪秀全、洪仁玕、容闳、郑观应、马建忠以及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都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这三个历史趋向都是贯穿近代史始终的历史线索。由于历史的动向不是单一的，阶级阵营也就比较复杂，反帝爱国斗争，农民阶级始终是主力；争取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独立，是以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主要力量的；而向西方学习的倡导者，则是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人物。这样，在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就比过去任何历史阶段都复杂，近代历史可供争论探讨的问题也特别多。加上近代史研究者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研究方法，掌握史料的程度以及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近代史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分析和评价也就不同。因此，在百家争鸣中，近代史领域争论的问题特别多。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从这本书、仅中国近代史一个断代，所涉猎的问题之多，内容之广，就可见一斑。五十年代以

ZZ25/10

来，近代史的研究和其它学科一样，凡是认真贯彻党的百家争鸣政策，对问题的讨论就有所深入和发展。凡是百家争鸣方针贯彻不好，讨论就受到阻滞。十年动乱期间，作为特殊的历史阶段。学术领域百花凋谢，百家哑然，近代史的研究也停滞下来。在这本书中，这十年是个空白，没有涉及，也没有必要涉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左”的思想路线得到纠正，史学领域一扫沉闷压抑的空气，史学界出现了从来没有的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百家争鸣局面，近代史领域里所涉及的重大问题，几乎都重新被提出来讨论，例如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立宪派的历史作用等等，对这些历史事件的评价，讨论都有所深入，也都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在这些争论中，许多问题看法日趋一致，纠正了历史错误。如对左宗棠的评价，人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考察他的一生，指出他镇压农民起义是地主阶级立场所然，但这个过错，并不能作为他一生的定论，从总的方面考察，左宗棠还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又如对甲午战争中刘步蟾的评价，由于纠正了过去所用史料的错误，评价便由贬到褒，接近历史真实。当然，大部分学术问题分歧仍然存在，讨论正在继续和深入。

这本书，汇集了近代中国几个主要历史事件的争论材料，即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以及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的统治等几个历史阶段，这些概述，基本上可以反映这段历史的复杂本相，再现了三十多年来中国史学界的研究情况和学术探讨的情况，不但对于历史研究者，就是对近代史爱好者也是读之有益的。

苏双碧

一九八五年二月于北京沙滩

目 录

序 言·····	苏双碧 (1)
第一次鸦片战争史研究述评·····	邱远猷 (1)
第二次鸦片战争史研究概况·····	邱远猷 (35)
太平天国史研究概述·····	苏双碧 (49)
洋务运动史研究中的分歧·····	乔还田 (117)
中法战争史研究概述·····	殷常符 (175)
甲午中日战争问题讨论综述·····	关 捷 (193)
戊戌变法史研究的种种争论·····	孔祥吉 (243)
略述义和团运动史的讨论·····	李炳清 (299)
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不同见解·····	丁凤麟 (337)
北洋军阀史研究举要·····	焦静宜 (410)
编后记·····	(442)

第一次鸦片战争史研究述评

邱远猷

一八四〇—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也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斗争的起点，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抑或是在世界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建国三十五年来，鸦片战争史的研究，虽然中经“十年内乱”的严重干扰，但总的来说，越来越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探讨的问题在逐步深入，研究的领域也逐步有所扩大。

一

在鸦片战争史料的发掘、整理以及论文、著作的出版方面，建国三十五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研究鸦片战争史，不能说是在建国后才开始的。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范文澜同志，就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收集、整理和研究鸦片战争史料，并把他的研究成果，作为首章写进《中国近代史》上册。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较有规模地从事鸦片战争史料的发掘、整理、研究，发表文章，出版著作，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五、六十年

代，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很有生气，取得了一些成果。“十年动乱”中，出现了把鸦片战争时期禁烟与反禁烟、抵抗与投降、爱国与卖国、革新与守旧的斗争纳入那个严重歪曲历史实际的“儒与法的斗争”中，鸦片战争史的研究窒息了。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科学的春天里，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又得到了发展，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据粗略统计，建国三十五年来，在鸦片战争史的综述，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社会和中外关系；鸦片贸易和禁烟问题，鸦片战争的经过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历史人物及其著作，书评、史料、传说、歌谣，遗迹、文物及其他等八个方面共发表文章约七百五十篇，其中，一九八二年近九十篇，为历年之冠；出书约六十种。

建国后，“为学习鸦片战争历史的同志们提供一些比较基本的资料”，中国史学会主编、齐思和等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6册），于一九五四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一九五五年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再版。这是建国后不久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内容最丰富的鸦片战争史料丛书。收录了私家著述、官修书籍、英方资料共一百五十种，其中包括三十种原稿本或传钞本。共二百四十七万余字，插图二十三幅。《鸦片战争》史料丛刊的出版，对推动鸦片战争史的研究起了积极作用。一九五八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委会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资料，约二十五万字。其中大部分是选译英国侵略分子的亲供，亦有一些清朝反动统治的档案以及私人编著等。这些资料绝大部分是中国史学会主编的《鸦片战争》所未

收录的中外文资料，对于研究长江下游遭受外来的侵略，有一定的历史资料价值。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由中华书局于一九五九年初版，一九七八年出版了修订本，二十二万多字。对研究鸦片战争期间规模最大、影响深刻的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三元里抗英斗争，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一九八三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的《鸦片战争史料选译》，近三十八万字。读书所收录的有关鸦片战争的历史资料五十八篇，是从鸦片战争时期在广州出版的英文期刊《中国文库》中选译的。《中国文库》（过去习惯译为《澳门月报》）系一八三二年五月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刊并担任主编，美国商人柯利芬出资经营，卫三畏主持印行，主要撰稿人有马礼逊、麦都司、郭士立、伯驾等。他们都是侵华分子，通过《中国文库》向美、英等国提供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文化等方面的情报，鼓吹用武力打开中国门户。其中有许多是研究鸦片战争史的原始材料。解放后已经翻译出版了的史料，该书一般不再选录。这为研究鸦片战争史又提供了一批外人资料。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长期从事鸦片战争时期禁烟派、抵抗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林则徐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先后编出了《林则徐集（日记）》、《林则徐集（公牍）》、《林则徐集（奏稿，上、中、下）》，由中华书局分别于一九六二、一九六三、一九六五年出版。三种书共一百三十七万多字，是建国以来研究林则徐较为集中全面、较有学术价值的一套史料书，为林则徐研究提供了方便条件。一九六三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的《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为研究鸦片战争史的薄弱环节思想史方面，提供了史料。中华书

局于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分别出版了《魏源集（上、下）》、《龚自珍全集》，为研究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革新派龚自珍、魏源的思想，提供了比较集中、全面的史料。

建国以来有关鸦片战争史的论著出版虽不下数十种，但知识性、通俗性小册子居多，学术专著很少，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牟安世著《鸦片战争》

牟安世著《鸦片战争》于一九八二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十二万四千字。这本专著是著者多年来从事鸦片战争史研究的丰硕成果，也是建国以来我国史学界出版的第一部篇幅较大、内容丰富的鸦片战争史专著。著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以大量翔实史料为基础，“从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地掠夺政策与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开始，对战前的一般情况进行回顾和追溯；然后依次论述中国的禁烟运动与鸦片战争前的国际国内形势，鸦片战争本身的经过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以及鸦片战争的结果和它的影响，等等”，进而证明“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人民在当时就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条道路是奋发图强，坚持禁烟斗争和反侵略战争，从而使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正常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卖国政策断送了一切：禁烟运动中途夭折，中国军民的反侵略战争陷于失败，结果是中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中国社会在战后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下，由封建社会变态地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所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也是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中吸取应有的历史教训。”

有一些问题，著者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譬如，“鸦片战争的经过”，著者认为“一八三九年九月四日的九龙之战，是鸦片战争爆发的起点。”“自此以后，战争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三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一、第一次广东战争阶段，从一八三九年九月到一八四〇年六月，为时共计十个月，战争主要是在广州附近沿海一带进行。”“二、英国侵略者北上骚扰沿海阶段，从一八四〇年六月到同年十一月，为时共计五个月。侵略者把战火从广东扩大到福建、浙江、江苏沿海，……最后北上直隶大沽口”。“三、第二次广东战争阶段，从一八四〇年十一月到一八四一年八月，为时共计十个月。战争范围又集中到广州附近一带”。“四、闽浙战争阶段，从一八四一年八月到一八四二年六月，为时共计十一个月。英国侵略者再度把战争范围扩大到中国沿海闽浙一带”。“五、侵略长江下游阶段，从一八四二年六月到一八四二年八月，为时共计两个月。”英军“最后迫使清朝封建统治者在南京为城下之盟”。

（二）杨国桢著《林则徐传》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杰出的民族英雄，历来专题研究论文很多。作为全面评述的专著，美国出版了张欽保的《林钦差与鸦片战争》（一九六四年），台湾出版了林崇墉的《林则徐传》（一九六七年）。杨国桢著的《林则徐传》（一九八一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则是建国以来我国第一部关于林氏的长篇传记。这部传记，不仅是著者二十年来刻苦钻研、辛勤撰述的结晶，也是我国史学界在这方面研究工作中所取得的一个可喜成果。

这部传记，从一七八五年（乾隆五十年）八月林则徐出生写起，迄于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二月逝世为止，共分十五章。在这部三十六万言的传记中，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广泛、深入地研究鸦片战争时期的历史，相当准确地认识这一时期的历史事变和传主所处社会矛盾的各个方面的基础上，对林则徐一生事业的功过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和评价，宣传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传统。这部传记力图反映林则徐一生的历史，表现其全人。书中不仅对他的关键时期即鸦片战争期间的活动，予以细致入微的描写，而且对世人论及较少的时期，如鸦片战争以前和以后的活动，也作了明晰的阐述。这部传记对史学界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重大问题以及前人尚未涉及的问题，如林则徐的家庭成份、林则徐与宣南诗社的关系、鸦片战争中的和与战、林则徐“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林则徐在禁烟抗英斗争中的思想变化、林则徐的“怀柔政策”和琦善的“羁縻政策”之间的区别、林则徐平定西南少数民族起事的性质等问题，进行了探索，作了史实上的辨正、纠谬和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

（三）朱新夏编著《林则徐年谱》

一九八一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部三十五万字的《林则徐年谱》，是著者花了多年心血积累资料、潜心研究的学术成果。它运用大量的翔实的资料，比较丰满地再现了林则徐这位伟大爱国者的光辉形象。

旧年谱往往孤立地叙述个人的活动，读后不能达到“知人论世”的目的。《林则徐年谱》摆脱了这一缺陷，把谱主放到十九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壮澜背景下来叙述。这样，就使林则

徐的言行与整个时代、社会、民族有血有肉地联系在一起了。在运用大量背景资料时，著者并非简单堆砌或剪贴，而是在认真分析研究原始材料的基础上，作了归纳分类，提要钩玄。例如，在摆出一八三一年全国鸦片问题的情况时，著者根据当时各地奏报，归纳为四种情况：“未种有销的省分有山西、陕西、山东、贵州等省；只栽而未卖的省分有甘肃省；种卖均无的省分有热河、广西等省；既种且销的省分有四川、湖南、云南、广东等省”。（第102页）读了这些综合材料，就使人对当时的全局情况有一目了然之感。

二

在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与中外关系、鸦片战争的经过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等方面，有许多重要问题，研究工作有了明显的进展和创获，学术争鸣有了进一步的深入。

（一）关于闭关政策的评价问题

这个问题在五、六十年代就已开始了讨论，到粉碎“四人帮”后，讨论就更加热烈了。主要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清政府的闭关政策“起了民族自卫作用”。因为“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当然都有权规定在对外贸易上实行什么样的制度”，清政府的通商规定，“固然其中个别次要的规定反映中国封建统治者落后的成见，如禁止‘夷妇’到广州，但是，当西方殖民者……为所欲为的时候，这些规定，就其主要部分来看，实在是当时中国方面所可能采取的必要的自卫措施。”“问题是，在国内以维护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为任

务的反动统治者，不可能把对外的自卫政策认真地贯彻下去，更不可能把这种自卫政策同争取本国的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结合起来。”^①

第二种意见完全否定清政府的闭关政策，认为“闭关政策不同于通常的严格管制对外贸易的政策，而是一种封建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不限于对外贸易和外交的领域，而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带有与世隔绝和盲目排外的倾向。”它“是封建专制和蒙昧主义的产物，阻碍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使中国受害，西方得利”。而且也“没有挡住洋货的输入和外国的侵略，‘关’是闭不住的。”^②

第三种意见认为，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防范汉族人民与任何外来势力相接触；防范欧洲商人冒险家在中国沿海的海盗活动。这种政策“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的闭关政策“客观上阻碍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实际上“成为弱者对抗强者的一种自卫手段。”^③

（二）关于十三行的历史

半个多世纪以前，广州行商即十三行问题就开始受到国内外学术界注意。一九三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梁嘉彬研究广州十三行的历史，是根据清代梁廷枏《粤海关志》的记载。《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

①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②苑书义、胡绳等：《中国近代史新编》上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③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商》开头有按语云：“国朝设关之初……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梁自称对《粤海关志》中梁廷枏的话始则“疑其说未可厚非”，继则觉得“其言必有所据”。郭廷以在编《近代中国史》^①这部资料集时，则据此断言十三行“这个名称，明时已有”，到了清代，不过是“沿明之习”，照旧称呼而已。吴晗在三十年代末写书评介绍《广东十三行考》时，鉴于明代史料中有“三十六行”之名而没有“十三行”的记载，同时又认为“十三行”是个数词，为了调和这两者的矛盾，就提出折衷附会的假设：“因为在粤海未设关之前，外商到粤贸易，地方政府不能不特别组织一个团体来对付，这个团体也许恰好是前明所留三十六行之十三行，因即称之为‘十三行’”^②。五十年代后期，彭泽益发表了《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一文，就十三行创立的时间进行了考辨，他根据新发现的广东督抚为建立洋货行招商承充和分别住行货税的布告，认为明代没有十三行这个名称和有关史实的记载，它是起源于清代，创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四月，并考证了广东十三行初建时的一些历史。这应该说是建国后的一个重要研究成果。不久，汪杼庵发表了《十三行与屈大均广州竹枝词》^③、《十三行设立年代》^④，依据《翁山诗外》考证了《广州竹枝词》的写作年代，断言是屈大均在“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即一六八四年春天作的”，认为是年即有十三行之名。此后，有些辞书之类的词条释文，对十三行仍习以为常的提到“相传名称起于明代”。有

①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四七年版。

②《中国社会经济集刊》第六卷，一九三九年六月版。

③《历史研究》一九五七年第六期。

④香港《文汇报》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日。